

黄志雄 著

知青家长

李庆霖同志：

寄上三百元，聊补无米之炊。


全国此类事甚多，容当统筹解决。

1973年4月25日

王明东

李子庆霖



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黄志雄 著

知

000016

知青
家长
李子庆霖

抽时
报 告

中央领导王洪文、汪东兴、姚文元诸同志：
乘着来京开会的方便，想在下中央首
，有话要说。未知行吗？
特先请示。

李子庆霖
一九七九年五月廿六日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知青家长李庆霖/黄志雄著. —北京: 中共中央
党校出版社, 2015. 10

ISBN 978-7-5035-5711-8

I. ①知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4081 号

知青家长李庆霖

责任编辑 王 君 任 丽

版式设计 李 灵

责任校对 王明明

责任印制 王洪霞

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(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)

邮 编 100091

网 址 www.dxcbs.net

电 话 (010) 62805800 (办公室) (010) 62805824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

字 数 63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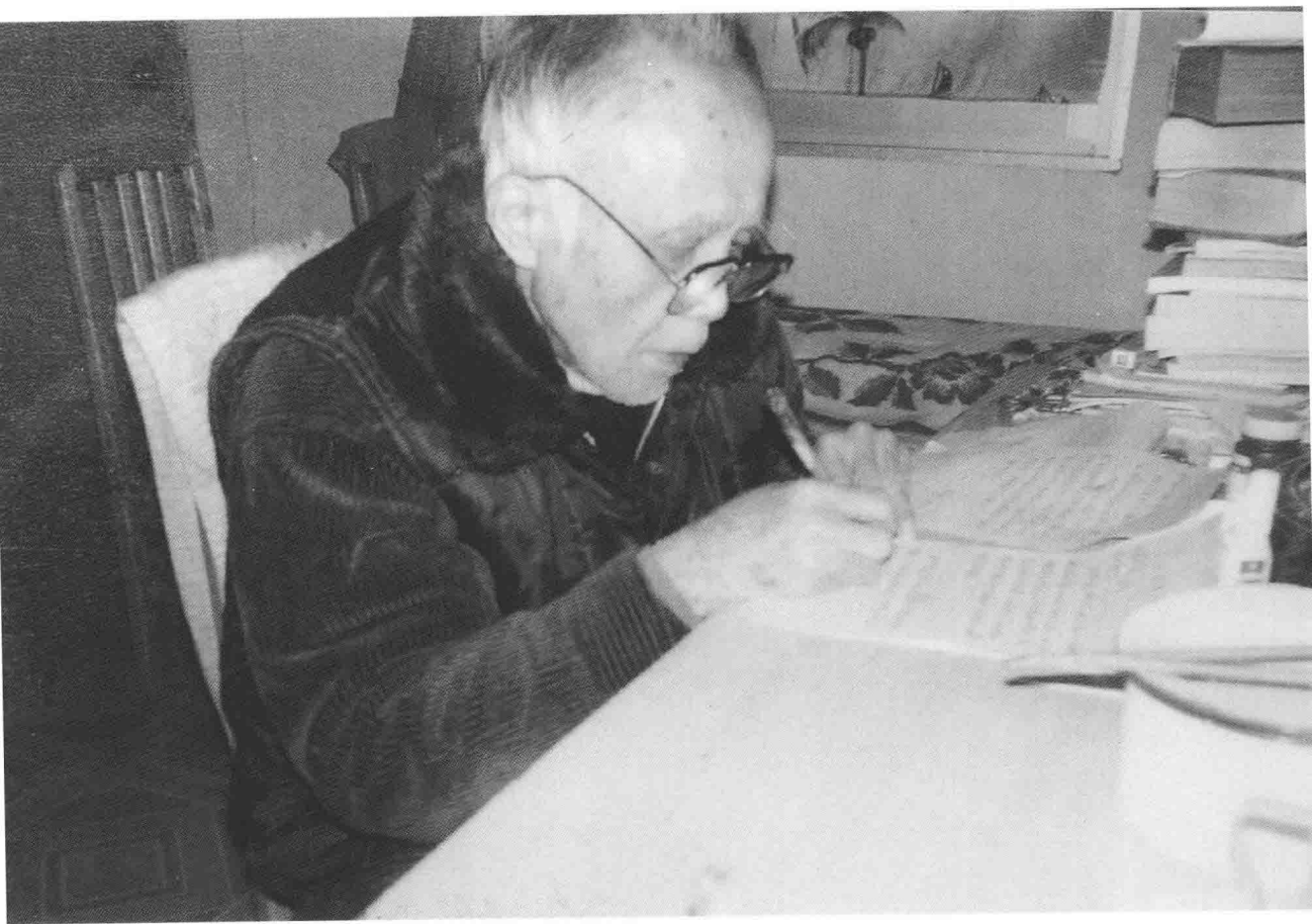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31.5

定 价 69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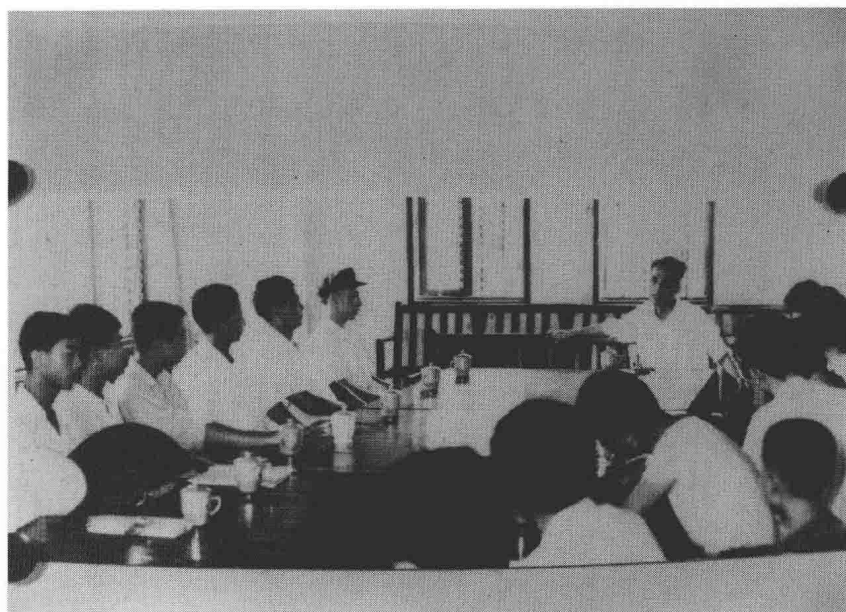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



“那时，我处理知青来信时，总是怀着家长的心情。”（2000年，李庆霖摄于家中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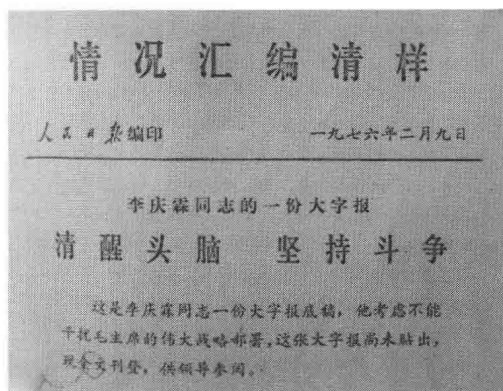
1976年初，李庆霖与妻子张秀珍合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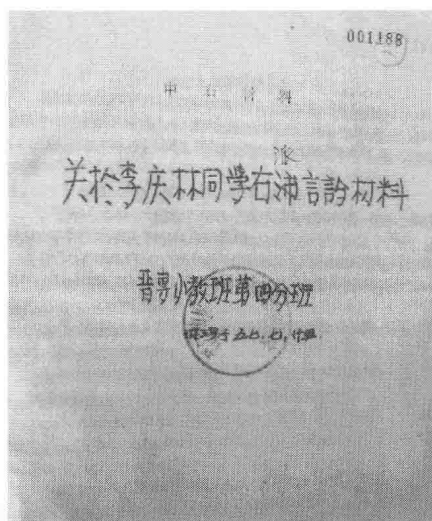
1976年6月，李庆霖（中）对《激流勇进》剧组人员说：“你们演好了，要上福州，进北京都可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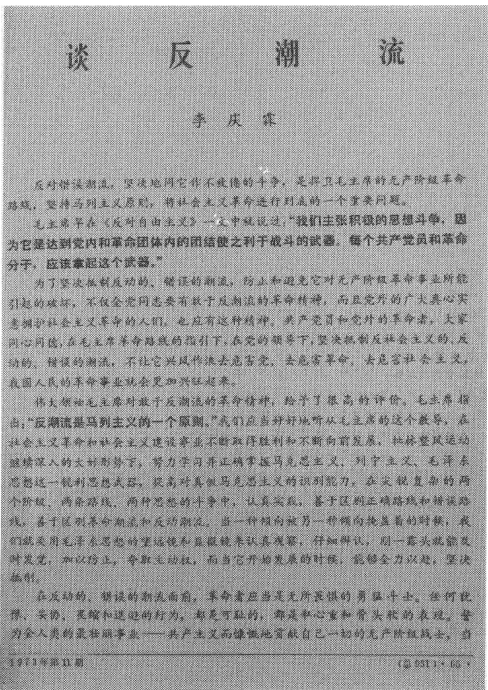
构筑本书的部分基础材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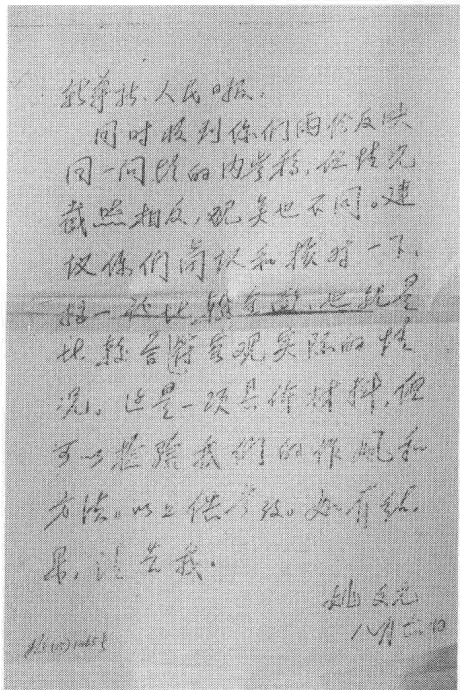
李庆霖刊登在内参上的大字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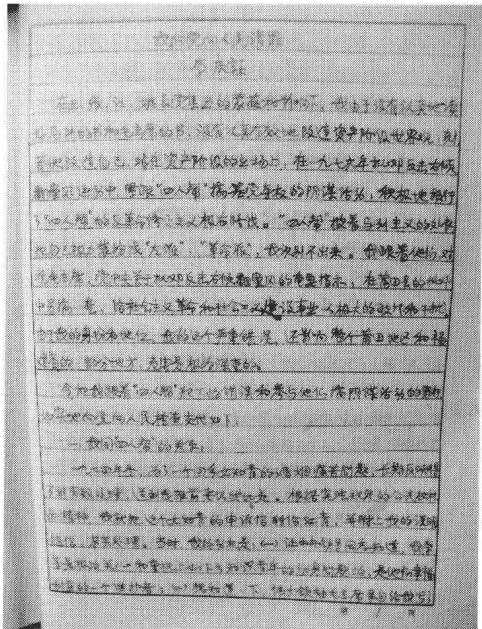
1957年，李庆霖被划为“中右”的材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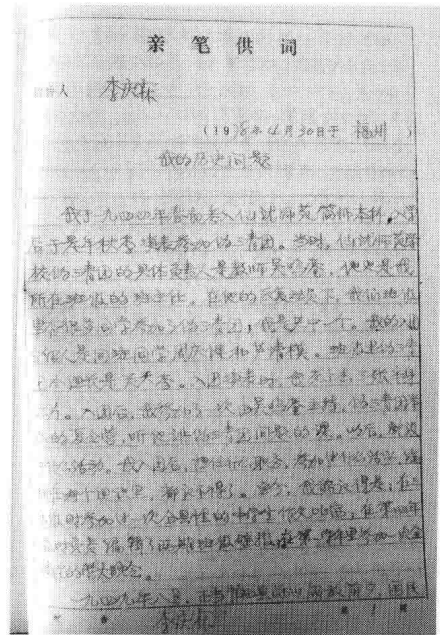
李庆霖发表在《红旗》杂志上的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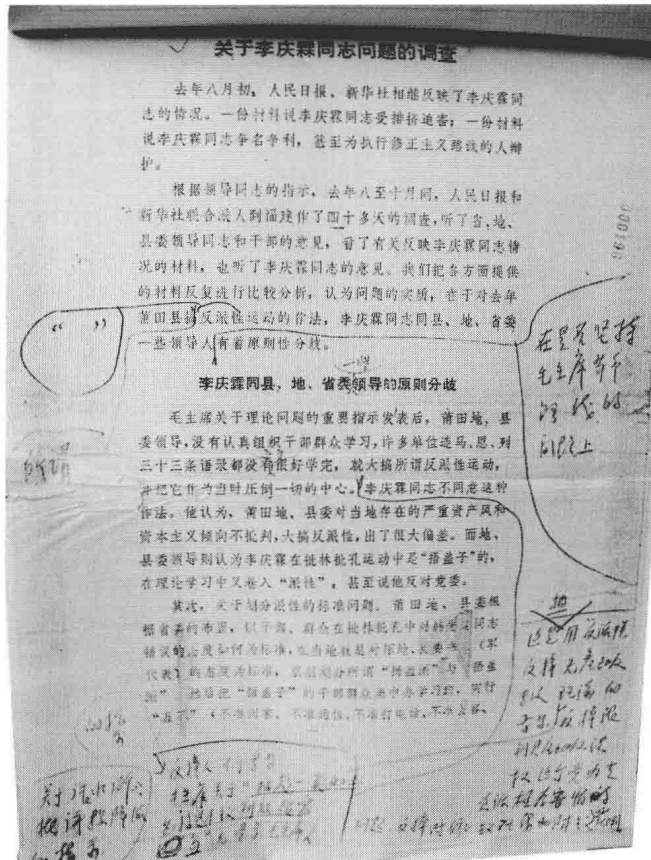


1975年8月6日姚文元给新华社、人民日报的信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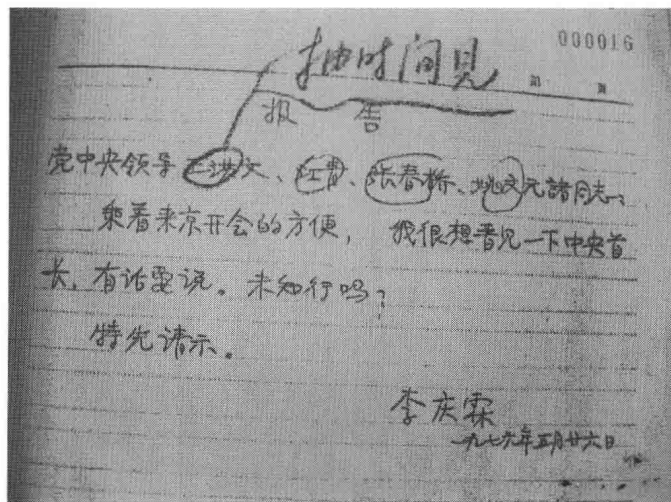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庆霖亲笔供词。





1976年2月，姚文元在内参上增添了“四个反掉”，把李庆霖塑造为“正确路线”的代表。



李庆霖写给“四人帮”的报告。



1993年秋，李庆霖探望病危的母亲陈赤柱，右为妻子张秀珍。



2000年五一节，李庆霖与儿子李良模。



2002年夏天，李庆霖在接受作者（中）采访时，轻叹道：“知青呀，整整一代人。”



采访时，李庆霖无奈地说：“主席复信后，各派势力都找我，要我支持他们。”



李庆霖笑道：“知青没有忘记我。”

（2000年7月摄于家中）



沉浮一生，终归尘土。

内容简介

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大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后，由于吃不饱穿不暖没钱看病没钱理发，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。1972年底，李庆霖眼看小儿子即将初中毕业，又面临着大儿子同样的命运，在“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”的情况下，写信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反映知青在农村生活的艰难状况，以及在知青招工、招干、招生中存在严重的“走后门、拉关系”等问题。

1973年4月25日，毛泽东给李庆霖写了复信，并“寄上300元，聊补无米之炊”，同时表示“全国此类事甚多，容当统筹解决”。1973年6月10日，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复信与李庆霖的来信作为中央23号文件附件下发全党，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，对知青工作严格检查，加强领导，总结经验，上报中央。国务院根据毛泽东指示，成立了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调查知青状况，并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，研究解决知青在上山下乡中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。李庆霖这封信，客观上为在此前后上山下乡的1700万知青带来了福泽。

毛泽东的复信，因缘际会，李庆霖此后担任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，以及莆田县教育局副组长等多项职务。1973年12月，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了李庆霖的来信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特殊年代，因为一封写给最高领导人的信及其批示，使毫无政治经验的小学教师李庆霖，一下子被推上了政治舞台，成为从中央至地方省、地、县各级不同派别人物拉拢、争取的对象。从此，他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。由于李庆霖的介入，在所谓的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运动中，福建被认为是全国“五个重灾区”省份，莆田县成为中央领导极其关注的地方。在政治斗争漩涡中，李庆霖的命运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与沉浮。他时而被树立为“反潮流战士”；时而被以参加工农干部读书班的名义“软禁”于省城，或被以省直机关干部工作队的名义下放到闽西山區；时而被许以县委书记、地委书记，甚至省委常委的职务。李庆霖在不同政治力量的裹挟下，终于无法把握自己，被政治漩涡搅得越来越深。

不久后，李庆霖的行为被指控构成反革命罪，界于杀与不杀之间，命悬一丝。

1994年4月17日，李庆霖刑满释放回到老家。沧桑的岁月磨平了他的棱角，但并未改变他经济窘迫的生活状态。当年，由于家庭困难与知青下乡的具体问题，他向毛泽东主席告了“御状”；到了晚年，经济窘迫问题仍然困扰着他。

2004年2月19日，李庆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。

前 言

一

作为一个福建莆田人，我出差在外时，时常有人打听有关李庆霖的情况，表情总是热切而又复杂，相当一部分人都知道毛泽东主席写给他的那封著名复信的内容，有些老知青甚至还会大段大段地背诵他写给毛泽东来信的内容，这使我既惊讶又惭愧。然而，当时我并没有产生写这本书的欲望。

创作欲望是在阅读大量有关资料中产生的。这些资料细致繁多，同我的工作有关。我阅读这些资料，与其说是出于好奇心，是为了熟悉我们福建莆田的人文历史，不如说是为了消遣打发日子。阅读是我几十年的生活习惯。仔细地阅读卷宗、比对证据，去伪存真则是我的职业习惯。通过阅读，我发现李庆霖很特殊而又很普通。他很特殊，是因为他与所有的“文革”人物不同，不是靠造反起家，而是因为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，说了老实话，反映了具体问题，从而在客观上为前后 1700 万知青带来了福泽。也就是说，他是靠做好事起家的。他很普通，是因为他虽是一介小学教师，但命运沉浮却具有时代性与代表性。新中国成立以后到“文革”期间，历次大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有他的份儿。反右时，他被定为“中右”；“大跃进”年间，他被插过“白旗”；“文革”初期，他被打为“三青团员”；“清理阶级队伍”时他成了“国民党党员”、“美蒋特务”。毛泽东主席给他复信后，他成了共产党员，担任了上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，下至莆田县教育局副组长等多项职务。不久，他的言行又被指控构成反革命罪，界于杀与不杀之间。

这样一个命运沉浮的人物，与那样一个主宰他人命运的时代，引起了我创作的欲望。

二

我阅读的材料当然包括李庆霖卷宗，也包括与他相关的许多人员的案卷。那一摞又一摞厚厚的卷宗，花去了我两年多的业余时间。几千万言的交代材料、证人证言、会议简报、会议记录、大字报底稿、电报稿、讲话稿、书信不仅为我勾画出李庆霖等人的活动轨迹与人物性格，而且连细节与场景也依稀可见。有时我只要穿针引线，将材料整理后，用线条将它串联起来，便是一个个内容生动、片段精彩的叙事场景。这些生动精彩的故事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力，以至于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、真实对话，看起来更像是文学创作。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，我选择了以纪实文学而不是传记的表达方式写作本书。

本书人物的观点、态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，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。如果离开时代背景，对本书人物进行评头论足，无疑是幼稚而可笑的。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就是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而曲折走向的一场“内乱”。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，斗争是主旋律，观望不得，逍遥不得。斗争是以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方式进行的，每个运动都必须站队、表态，稍有不慎，便要身败名裂。在这样一个荒唐的岁月与恶劣的政治生态下，一些人为了身家性命，难免被迫要说几句荒唐话，甚至被迫做几件荒唐事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毕竟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。

我无意于翻旧案算旧账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早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决议》）就已明确否定了。《决议》指出：“历史已经判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。”对于有“文革”情结的人，不妨再细心读一读这份历史性文献。通过本书写作，我进一步理解了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意义，认识到邓小平伟大的历史地位，也深深地体会到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，民主法治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。

我无意在作品中宣扬什么，也绝不刻意褒贬某个人物。我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离得不远不近又够远够近。由于年龄的原因，我远到无法参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，足以保持审视的距离；近到深可理解那些人物在特定年代的所作所为。由于工作的便利，我可以将听到、看到的一些材料用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或许对，或许不对，但绝不违背良知。我无意给书中人物刻意增添一点什么，但遗漏与偏颇却是难免的——那是因为我学识浅薄与材料不足。正如盲人摸象，或许我只摸到了大象的腿，但我会说这大象像根柱子，而绝不会说像堵墙。

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，记忆总是有所选择的，即便是一个最为真诚的人。那些痛苦的、引以为耻的、有损良心或者尊严的经历，往往会被内心压抑至潜意识而被忘得一干二净；而那些能够去除痛苦、引以为荣、能够表现良知或者体现尊严的经历，往往成为最牢固、最向往的记忆。我向来对所谓亲历者的回忆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。翻开某些人物的回忆录，我有时被书中的真实感动，也有时为其中明显的虚假恶心。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，也即任何人都无法评判自己的行为，这表面上是程序问题，实质上是人性因素。

构筑本书的基石是卷宗材料，它是当事者在事后留下的痕迹。这既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当事者接受采访时自我标榜的虚夸成分，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由于人性弱点带来的记忆选择性遗忘问题，但它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在政治高压下，当事者自诬或诬陷。我在修改本书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引用相关材料时，也力所能及地予以提醒。

尽管我采取这样的态度进行写作，但表达方式却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；提供给读者的人物形象，也是属于文学艺术画像。

三

1996年，我完成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初稿。后来，我又用了十几年时间，阅读了大量背景资料，多次走访了包括李庆霖在内的相关人员，倾听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意见，对文稿进行了多次大幅度的修改。每次修改文稿的时候，我都要重新阅读那一摞又一摞厚厚的卷宗，查找一本又一本参考书籍，力求本书的重要细节能够经得起读者的质疑与推敲。

本书成稿之后，曾有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阅读过底稿。年长者大多送我两个字：真实。我想这是对我的最高奖赏，因为真实既是我写作初衷，也是我写作目的。当然，这种真实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真实，而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——那是历史学家的工作。我所担心的是尽管自己有求真的写作态度，恐怕也达不到真实的高度。年轻者也送我两个字：荒唐。

送我“荒唐”两个字的朋友都是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，他们以对待魔幻小说的态度，阅读本书，除了感到新鲜外，无法理解书中人物的所作所为。他们认为，本书是满纸荒唐言。

说“真实”与“荒唐”的都是我的朋友，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的年龄，以及由于年龄差异而形成的对事务判断的差别。我想，荒唐的不是我键盘敲击出的方块字，而是那个岁月。我希望，那个荒唐的岁月，永远不要重现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告御状 (1)

那天，李庆霖怀里揣着刚刚写好的信件，沿着小城巷道前往县邮电局。邮电局离家不过十来分钟的路程，李庆霖走走停停，心里一直打鼓，他怕毛泽东收不到他的信。突然，他脑子里灵光一现，想到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经常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。他兴奋地趑趄回家中。

第二章 调查与反调查 (27)

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显然也是经过了一番思考，他甚至征求过他人对李庆霖来信的看法。1973年12月中旬，他在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时，曾经谈到李庆霖来信，他说：“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，我看了相当好呵，有人说那里头有刺，就是要有刺呢！我摆在这里几个月，经常看，看了三遍半，这才决心写回信。”

第三章 从三青团员到共产党员 (51)

李庆霖心情十分复杂，他昨晚听到消息时，心中充满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，后来又对自己没能及早提出入党要求感到懊悔，再后来他对省、地、县委领导又生出一股莫名的火气。现在，他听县委书记这一说，便虎着脸不说话。他知道自己这个四届人大代表是钦点的，至于安排为党内代表还是党外代表，那是省委的事。他决不会因为入了党，而失去人大代表资格。

第四章 形势比人强 (73)

《谈反潮流》在《红旗》杂志发表后，李庆霖非常兴奋。他后来在狱中回忆说：

文章发表后，我揣测，这是姚文元对我的具体支持，就感到又惊又喜。像我这么个农村小学教员，会受到中央首长姚文元的重视，支持我反潮流，真是使我受宠若惊。我看到自己写的文章，居然能发表在党中央机关刊物《红旗》杂志上，一时心情愉快，喜欢极了。